

# 经济起飞的轨迹角

〔美〕弗雷德里克·C·戴约编

——国际新译丛



〔美〕弗雷德里克·C·戴约编 王燕然 王逾西译 史敏 李传家校

# 经济起飞的新视角

——亚洲新兴工业化实体的政治经济分析

责任编辑：章新语  
责任校对：文俊峰  
封面设计：鹿耀世  
版式设计：李玲玲

经济起飞的新视角  
——亚洲新兴工业化实体的政治经济分析  
JINGJI QIFEI DE XINSHIJIAO

〔美〕弗雷德里克·C·戴约 编 王燕然 王逾西 译  
史敏 李传家 校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  
新华书店 经销  
太阳宫印刷厂 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9印张 2 插页 198千字  
1991年1月第1版 1991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 500册  
ISBN 7-5004-0830-7/D·74 定价：3.85元

6.9.1

## 出版说明

本世纪60年代以来，新加坡、南朝鲜、台湾和香港等亚洲新兴工业实体经济的迅速增长引起了世界的瞩目。这些工业实体的起飞为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经济发展模式。

奉献给读者的这部译著用政治分析方法从广阔的经济发展理论和世界经济相互依赖的角度解释了它们发展的内在和外在的原因。尽管书中的观点并非都是我们认同的，但是，为了保持原书的完整性，便于我国学术界对发展经济学全面、深入的研究，在翻译出版时除了作个别必要的改动和说明外，基本上全文照译。

## 作者简介

- 理查德·E·巴雷特：芝加哥伊利诺大学社会学副教授。
- 程同杰：圣迭戈加利福尼亚大学国际关系和太平洋研究院助理教授。
- 秦苏汨：南朝鲜大邱庆北国立大学社会学助理教授。
- 布鲁斯·卡明斯：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教授。
- 弗雷德里克·C·戴约：纽约州立大学布罗克港学院社会学副教授。
- 彼得·埃文斯：圣迭戈加利福尼亚大学国际关系和太平洋研究院教授。
- 斯蒂芬·哈格德：马萨诸塞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国际问题中心政府及协会讲座助理教授。
- 查默斯·约翰逊：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亚洲研究所沃尔特和埃莉斯·哈斯讲座教授。
- 哈根·库：马诺厄夏威夷大学社会学副教授。

# 目 录

前 言 .....	弗雷德里克·C·戴约 (1)
导 言 .....	弗雷德里克·C·戴约 (3)
第一章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出口导向 工业国(地区):相似与差异.....	理查德·E·巴雷特、秦苏汨 (16)
第二章 东北亚政治经济的渊源与发展:产业部门、 产品周期、政治结果.....	布鲁斯·卡明斯 (42)
第三章 东亚新兴工业国(地区)的政府与 外国资本.....	斯蒂芬·哈格德、程同杰 (92)
第四章 政治体制与经济成效:日本、南朝鲜和 台湾政府与企业的关系.....	查默斯·约翰逊 (151)
第五章 在东亚发展中政府、社会阶级和世界体系 的相互作用:南朝鲜和台湾.....	哈根·库 (186)
第六章 政府与劳工:东亚发展中的政治排斥模式 .....	弗雷德里克·C·戴约 (205)
第七章 东亚的阶级、政府和依赖性:拉美主义者 可吸取的教训.....	彼得·埃文斯 (231)
第八章 联盟、制度和联系顺序——有关东亚发展 的战略能力模式.....	弗雷德里克·C·戴约 (258)

## 前　　言

亚洲的新兴工业国和地区（南朝鲜、台湾、新加坡和香港）在过去的20年里，经历了迅速的工业增长。它们在经济增长的同时，还实现了收入的均等化、低失业率，并且几乎消除了使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社会最低层人民境遇更加恶化的赤贫。最令人惊异的是，这个“经济奇迹”发生在自然资源和物质资源贫乏的小国和地区，而其他地方的经济增长却离不开这些资源条件。

东亚经济增长主要是以轻工制成品出口为基础的，它们的经验常常被用来证实正统的发展理论。正统的发展理论强调贸易自由化、私人企业和国家有限的经济作用给经济带来的好处。最近，许多观察家对国家在经济发展中只发挥了间接的和微不足道的作用的看法表示异议。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至少在新加坡、南朝鲜和台湾，在近些年的经济调整中，政府进行了全面的经济干预。这本书的目的之一，就是部分地通过探讨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为东亚经济发展寻找更适当的解释。

在讨论政府的作用时，人们一直侧重于政府在指导当地经济发展，处理对外经济关系中所实行的经济干预。对东亚国家（地区）有效地实施明确的发展战略的非凡能力所依赖的社会政治和制度基础，则没有予以充分的注意。这种能力

根源于外部的政治联盟、国内的专制统治和高效率的经济制度。本书的第二个目的是理解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有效地干预经济的社会政治基础。

外国的资本、市场与技术同国内经济增长的联系对经济发展所产生的明显的积极效果，看来，给现代化理论的假说所提供的支持要比给依附论的支持大得多。由于这个原因，在讨论东亚经验中的社会政治方面时，我们不是一般地拘泥于依附论所提出的理论问题。本书的第三个目的是有选择地从现代化理论和依附论的角度对东亚的经济发展在理论上进行全面的阐述，并以批判的眼光为深入详尽的研究提供一个基础。

有许多人为本书提供了帮助、建议和支持，难以一一列举。在此，要特别向理查德·艾布拉姆斯、加里·格雷费、珍妮特·萨拉福、罗伯特·斯诺和盖尔·厄尔曼，还有丛书的编委彼得·卡策斯坦，表示诚挚的谢意。彼得·卡策斯坦最后帮助我们修订了这本已经使我们精疲力竭的书。最后，还要感谢手稿编辑罗杰·海登，感谢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和世界和平基金会允许重印布鲁斯·卡明斯书写的章节，感谢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东亚研究所允许重印查默斯·约翰逊书写的章节。

## 导　　言

70年代，东亚新兴工业国（地区）台湾、香港、新加坡、南朝鲜持续而显著的经济增长，同其他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的经历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同样令人惊奇的是，它们工业的迅速增长是与比较均等的收入分配结合在一起的。虽然，东亚的“经济奇迹”已经吸引了发展经济学文献的极大注意，但是，对东亚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某些理论争论，这些争论使关于拉美和其他地方经济发展中社会政治方面的讨论活跃起来。本书试图通过考察东亚新兴工业国（地区）发展的社会、制度和政治源泉，尽可能把东亚工业化经验汇入发展理论的主流。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直到60年代早期，所建立的大量关于第三世界未来经济发展的理论是以乐观主义为特征的。作为世界霸权力量的美国，也是人们普遍持有的一种正统观念的根据地，即美国资本、发展援助、文化价值观和政治、经济制度的扩散将推动经济发展进程，还必然会阻止共产主义革命。强调依赖国内外自由市场机制的优越性的新古典经济学家，在自己的著作里把这种正统观念系统化了。在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和一些制度经济学家中间，这种普遍流行的正统观念在被含糊地称作现代化的看法中找到了归宿。现代化理论的专家们在学科的研究对象、分析水平和理论模式上

大相径庭，但是他们某些关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广泛假设却是共同的，这些假设对本书有特殊的重要性。这些假设断言，同发达工业社会的政府、企业、市场和发展资源（尤其是资本和技术）的国际联系，以及靠自身力量维持的增长和经济部门间的相互促进越来越发挥积极的长期影响。这个假设同新古典经济学强调的依靠市场力量作用的对外经济政策的优越性恰恰是根本对立的。第二项假设认为，虽然这些外部联系在开始发展时可以发挥重要的经济作用，但维持增长的主要决定因素存在于发展中国家自身，一旦资本、文化价值观等的扩散消除了发展的传统障碍，经济增长就会以递进的方式展开。第三项假设认为，长期的经济发展可以促使日益接受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更多地参与国内事务，并在更大范围内增进各阶层人民的经济利益。

对许多观察家而言，60年代的“联合国10年发展计划”使这些关于发展的正统理论假设落空了。尽管美国仍在继续提供发展援助，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水平也在增长，工业国与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经济鸿沟却在继续加深。第三世界国家中某些部门的增长没能刺激全面的发展，民主制度没有扎下根，收入不均等更加恶化，日益严重的经济政治危机使早先希望社会稳定的良好愿望成为泡影。研究发展问题的学者对这种状况的反应极不相同。一些人认为，政府应该在这种经济中发挥更大作用，以抵消增长中的制度与文化障碍，增加国营企业微弱的创业精神。另外一些人试图寻找更能满足平等和经济增长要求的政策，把农业和农村地区的全面发展摆在优先地位，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满足发展自身的基本要求。特别引人注目的是，现代化理论家们越来越强调需要强有力的执行发展政策的政府，与此并行的另一种看法是

愈益坚持认为美国国际发展署的一部分任务是创立政府的计划机制。萨缪尔·亨廷顿最有说服力地阐明了这一观点，他认为只有官僚政体实行集权，才能增强国家在社会中进行现代化改革的能力。

由于这些脱离传统观念窠臼的思想标志着知识分子的日益觉醒，更新的、更悲观的看法又出现了。在这些标新立异的观点中，依附论具有特殊的重要性。依附论源于那些力求使民族经济摆脱发达工业国控制的拉丁美洲学者和研究帝国主义的新马克思主义作家。尽管这两派作家在许多理论观点上存在尖锐的分歧，但他们却一致认为，发展中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外围国家与核心国家（第三世界和工业国）的联系，导致外围国家遭受剥削与经济停滞，而不是增长。这种说法代表了60年代出现的依附论的观点。尽管可能有些过于简单，我们还是有必要明确一下通常人们所接受的三个主要观点。

第一，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加入扩张性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会鼓励供出口的农业和矿产品生产的专业化，并使初级产品出口部门同外国资本和市场建立相应的联系。

第二，虽然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加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可以带来短期经济增长，实现早期的生产和就业目标，但从长期来说，对核心国家市场、资本和技术的不断依赖会形成遏制发展的力量。以出口初级产品、进口制成品为主的贸易格局会导致外围国家贸易条件的更加不利与恶化。外围国家的生产面向核心国家的市场，以及经常依赖核心国家的技术、资本、要素投入，会造成国内经济结构的扭曲，并使对外经济联系优于对内经济联系永久化。这种经济结构的扭曲阻碍了工业的多样化，抑制了富有生机的外向部门对其他经

济部门的刺激作用。与这种境内小块“飞地”增长联系在一起的，是出现了从中获利、并力求保持这种发展模式的社会集团和阶层。这些社会集团包括收入较高的工人、一小部分民族资产阶级和政府官僚。最后，对核心国家资本和技术的依赖，特别是通过外国直接投资和外援的方式，使外资的利益渗入到国内企业和政府机构的经济决策之中。因此，作出的经济决策常常反映了外国政府与资本的利益，尽管它对东道国的发展可能产生消极的作用。另外，对外部资本和技术的依赖还意味着利润的外流，即通过资本偿还、许可证费用、租金、利息支付、转移价格以及其他形式把经济剩余转移到了核心国家的企业。

第三，对核心国家的依赖，对经济平等也有不利影响。为了资本积累的利益，跨国公司、政府及政府间机构通过迂回的方式，力求建立能够控制工会、限制工资和公众消费水平的强权统治。跨国公司还使用在核心国家发展起来的资本密集技术，这种技术只能为少数人提供高工资的就业机会，而将其他人摒除在外。而且境内“飞地”的发展还伴随着地区和部门之间严重的不均衡状态。

如果说新古典和现代化的正统理论一直指导着美国和其他核心国家的外交政策和发展援助计划，那么，依附论在一些拉丁美洲国家早期的发展战略中受到了特殊的青睐。30年代的世界大萧条和紧接着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充分暴露了以初级产品出口为基础的经济发展战略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世界市场的崩溃使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政府倡导经济多样化，特别是制造业多样化发展的必要，随后，这个重要的教训导致了进口限制和关税、货币重新定值以及其他一系列政策措施的制订，旨在保护和扶植国内工业。拉丁美洲的 3

个新兴工业国，巴西、墨西哥和阿根廷最坚决地推行了这种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

依附论在理解传统的依赖状况时依然是有用的，但在理论上进行修正的必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否则，无法解释新兴工业国的经济活力。由此，一种比较新的思维习惯发展起来，尤其是从费尔南多·卡多索和恩泽·法利特1979年的著作中可以看到这一点。不像那些僵化的依附观念，这个“依附性发展”学派意识到依附和经济增长之间的更为复杂的和不确定的关系。这个学派的修正主义专家们力求搞清楚国内和国外的集团、阶级和组织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如何影响发展的。对各种依赖情况的分析，说明了依赖的社会政治环境，它决定了增长的可能性、性质和速度。例如，在传统依赖状态下，外国控制的农业和采矿业是经济的主导部门，造成了长期的经济停滞。相反，强有力的政府制订的、为跨国公司和当地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国内工业化协调发展战略，促进了多样化的经济增长。

重要的是应注意到，尽管这个比较灵活的依附论变种学派，赞成对经济增长进行更实际和开放的研究，但它们依然固守着传统依附论的几个关键假设。依赖的事实还是被看做从根本上制约了发展战略和发展的成功。彼得·埃文斯在讨论巴西的情况时，明确提出了发展的外部限制，“只有在得到更大的帝国主义制度的支持时，依附性的发展才是可行的。依附性发展的全部成功要看跨国公司是否愿意投资以及国际银行家是否愿意扩大信贷。”“像传统依赖一样，依附性发展终将达到它的极限……如没有核心国家的盟友，巴西模式就无法生存。”日益增多的政治上的不满，特别是民族资产阶级中受排斥部分的不满，成为持续的依附性发展的第

二个政治上的限制。

两种不同的依附论共同承认的理论前提还有：随着时间的推移，依附程度会自我强化，它表现为经济结构的进一步扭曲，决策渗透和出现依附阶级；这种依附性发展将会导致政治上的独裁和经济上的不平等。对拉丁美洲新兴工业国迅速工业化过程的研究为这些观点提供了佐证。拉丁美洲的工业扩张，是同跨国公司不断加深的渗透分不开的。尽管增长速度很快，却伴随着高度不平等。六七十年代的政治高压统治，其目的是保护外国和本国资本利益，削弱民主主义者对资本积累和政治稳定的威胁，控制由不均衡和不平等发展造成社会经济和政治的紧张局势。

拉丁美洲新兴工业国的发展敦促人们对依附论进行反思；东亚新兴工业国（地区）的发展又对依附论提出了更为根本的挑战。这些国家（地区）在六七十年代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为世界市场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同拉美新兴工业国相比，东亚新兴工业国（地区）曾从需要出发奉行以贸易为基础的更加对外开放的发展战略。东亚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水平不像拉美那样惹人注目，但是，东亚迅速和持续的发展一方面得益于早期阶段接受的大量外国资本援助，另一方面，是由于采用了开放的、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模式。虽然，独裁统治是东亚的典型特征，而指导依附性发展的正是这些实行独裁统治的强大的执行发展政策的政府，但是，这个地区的经济增长在某些方面已经偏离了依附论。具有特殊重要意义的是，它们有能力果断地调整战略和经济结构，以适应变化的外部环境对发展提出的挑战，而达到相对充分的就业、实际工资的不断增长和较低的经济不平等。这些偏离使一些观察家乞灵于传统观点来解释东亚的发展。贝拉·巴拉瑟

在再次坚持新古典学派关于开放的、市场引导的经济增长战略方面具有特殊的影响。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在处理对外经济关系和国内经济问题方面国家干预的重要性，这种认识引导另外一些人进一步探索强大的追求发展的政府所执行的增长战略的影响。尽管本书的作者们在对待依附论的态度上有尖锐的分歧，但都逃脱不了主张中央集权下经济统制的传统立场。

### 东亚的发展：国家发展战略的作用

发展经济学的文献认为，在一定的历史和经济条件下，国家的经济干预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这些条件包括：经济落后或发展迟缓；初级产品出口阶段的经济增长乏力或失败；扶植进口替代工业的必要性；抑制企业家精神和投资的文化与社会障碍；像“飞地”式的发展、国内经济缺乏联系之类的经济结构扭曲；跨国公司对主要经济部门的支配；必须清除因循守旧和顽固的反对派力量，等等。另外，在经济发展以重工业或资本—技术密集工业为基础的地方，特别像50年代以来的拉美新兴工业国以及70年代以来的亚洲新兴工业国（地区），发展战略的干预是很重要的。在经济条件的变化要求经济结构和外部经济关系迅速转变的地方，以战略来指导经济的发展也是必要的。

我们不打算在这里一一列举和说明所有的条件，但是有一点是清楚的，即近期第三世界国家在发展中所遇到的政治和经济困难比发达国家在相应的经济发展阶段所遇到的要大得多。这种情形说明了主张国家干预的解决办法与当前第三世界国家的不发达问题的特殊关联。1945年以来，第三世界

国家一直致力于通过不同程度协调的经济增长战略来加速经济发展，几乎没有例外。除了这一基本点之外，还要提及一些重要的区别。第一，发展战略与政策工具的配合，随着时间的推移出现相当大的变异。某些战略只不过是各集团、各组织和各阶级之间不协调的、变化多端的政治斗争的产物。第二，发展战略就像含糊的宣言，主要不是为了满足发展经济的需要，而是为政权的合法存在和稳定服务。在统治者对发展问题漫不经心，惧怕反对势力在政治上取而代之的地方，发展战略都反映了短期的政治需要，而不是长期的经济要求。第三，问题最多的大概是在功效方面。关于以战略为中心的经济发展的回顾，说明必须假设或是证明战略的实现。显而易见，貌似与实际经济结果一致的发展战略的存在本身并没有揭示战略和经济运行之间的因果关系。有时候，发展战略只是在事后反映经济的实际趋势，而不是在事先指导经济的发展。比如，拉美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被明确地作为一种战略提出来的，而这也是在特定的工业化政策的早期实验鼓励了进口替代工业化之后。有时候，政府通过制定发展战略来维护自己的合法地位，这些战略以国家采取的行动来解释经济上的成功。

最后，还有一个国家和发展战略之间的关系问题。观察家们经常把经济增长战略同国家干预联系在一起，但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形，在制定和实施发展战略中，国家的当权者并没有发挥主要的作用，特别在地区层次上，比如像在香港，当权者与经济的集中相互兼容。很清楚，区分政府和非政府精英在资本主义发展战略中复杂的相互作用是十分困难的。在这里，我简单区分一下国家主导型和国家指导型发展战略。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国家主导型发展战略为了实现战略

目标，需要由国家机构对私营部门的决策和市场交易活动进行持续和有选择的干预。与前者不同，国家指导型发展战略，强调私营部门在实现发展战略中的作用，而国家为了实现既定的发展目标，则通过建立一整套政治、法律、基础设施、经济结构制度以指导私营部门的活动。在拉美的发展过程中，就可以依据上述的区分，把国家主导的进口替代工业调整时期（50年代的巴西）同依靠国家高压统治实行的国家指导下的、新保守主义经济自由化试验时期分开（70年代中期的智利）。

本书各章提出了持续的、发展的、政府主导的战略对南朝鲜、台湾、新加坡经济的增长和调整的重要性。作者通过审查政策和工业决策的有机联系，把发展战略同经济成就联系起来。他们审查那些促使战略形成的广泛的社会政治关系，了解国家主导的工业化如何转而对社会发生影响。最后，他们考察对外经济政治联系对国内政治和经济发展的影  
响。

在第一章里，理查德·E·巴雷特和秦苏汨通过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对照，研究东亚发展的实际过程。他们发现香港、新加坡、台湾和南朝鲜共同表现出一种以一些战略性出口导向工业的扩张为先导的独特发展模式，这些出口工业已经促进了其他工业的增长和就业。东亚的工业化同坚持依附论的理论家们所期待的结果大相径庭，那些理论家们认为对外部经济的依赖必然同长期的经济停滞、经济不平等、丧失调整经济和制订发展战略的自主权和软弱的本国政府联系在一起。还有，亚洲新兴工业国（地区）的经济模式不仅表现为持续的高速增长，而且有相对平等的分配，有不断调整国内经济结构和在世界市场上的地位以适应变化着的经济环境的